

**仿写奥威尔《猎象记》：
揭露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真相**

大概在公历 2014 年初，我被一大堆实质性的评论震惊了，虽然矛头并没有直接指向我，但却影响了我这周稍后做出的重大决定。在“咨询论坛：向卑诗省华人所犯历史性错误致歉”系列会议中，身为第三发言人的我已经有不少的忧虑。我的母亲，作为一名加拿大华裔人权活动家，说服我去发言，而我出于道德义务感要这样做。缴纳人头税的苦主于十九世纪 70 年代移民到加拿大，我作为他们的后代，这些年来见证了社会和政治的长足进步，对于日渐成熟的我也许应该面对，以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行动（虽然说实话，我对环保问题更关心，但是这问题仍然举足轻重）。从我九岁那年起，我身边就不乏老派的活动家，一些被动，一些激进，但都为了有更大的创造变革。如果我没有这些背景，我强烈的发言欲望可能更大。会议本身（有目的地）让卑诗省自由党政府半心半意的为他们之前的省执政党派犯下的错误道歉。

我很清楚也认为，既然过错已经犯下，当然需要补偿，即使只是为了心中的安宁。道歉不应该只是针对加拿大政府推行的人头税和排华政策，并且还要针对卑诗省政府提出的所有反华立法与这些反移民的行为。不过，当我开始对会议做进一步的研究（为我的发言做准备），我开始感到越来越灰心。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名加拿大公民，要为那些没有发言权，或那些可能不会被听信的声音发表意见。之后我才意识到（当然我以前知道这一点，它只是在这一点上确实击中了要害）可能我也是那些并不重要的声音之一。

大约在我被安排发言的会议的前一周，我母亲通过互联网发给我一些关于前几次会议的文章。在那些会议里，有一些我从小认识的活动家，和卑诗省国际贸易部及负责亚太战略和多元文化的——屈厅长阁下，公布了对人头税纳税者及其后裔经济补偿 \$9,000,000 的细节。这表明了道歉是真诚的，政府愿意展示他们的真诚，并且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政治伎俩（他们的计划早在前一年的三月被发现——希望能用道歉去换取“民族票”，并在下次选举提供了一个快捷获胜的机会）。

这次补偿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的母亲和总理哈珀都有参与 2006 年中国人头税申诉会议。虽然我知道，每一个由政治家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策略，我只能希望他们的策略会真正有助于他们的公民生活（不是说，总理已实际履行这些期望）。加拿大政府虽然已经从移民中收集了超过 \$23,000,000 美元的税金，

但是只赔偿了一小部份，不过在二十世纪的货币价值上似乎显得稍为合理。更严峻的问题是，卑诗省政府实施一些法律限制他们的权利，如拥有财产、就业、投票权、甚至与白人结婚——而加拿大政府都要为这些行为道歉。然而，正如我读了文章的评论，其中在 1947 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探索者被称为“爱发牢骚的婊子”，他们要求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犯的错误道歉，（而这些中国人离开他们国家的时候并没有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会议是针对道歉的措辞做全面的咨询，但是新闻发布却在会议的前一天发出，而且只有中国社区媒体。这不是包容性的。我发现，随着我周围堆积的信息越来越多，我开始觉得这可能只是另一种政治伎俩。无论如何，作为一个 17 岁，几乎不问政治，年轻活动家，我不知道如何处理类似的事情。在这个政治系统，不管我做再多也不会有改变。我的话重要吗？无论如何，我想对话的人不会出现，他们坦然自若地呆在他们的计算机显示器前，等待下一次有反对声音的文章出现的时候大事化小。

我读了许多文章，所有人认为经济补偿是不应该的——口头道歉就足够了，而是需要对这些问题采取教育措施。我也看了评论部分至少七次——稍有不同的用词和语法结构，当然——“我要罗马人对基督徒的所作所为道歉，并且给我一大堆钱”，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情况的讽刺回应——它激怒了我，人们也被轻视，有些事情深深地影响到人们。而时事评论者发表不要让成长中的中国人口威吓到政府做他们想要的事情，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内部冲突，像是英国人歧视爱尔兰人、大部人欧洲人歧视意大利人，而向这些人要求道歉是毫无意义。所以，我想知道，这是否也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迫成为日本军队性奴隶的“慰安妇”不值得得到道歉，即使到现在，在韩国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外他们还还在争取，难道日本政府是不同的吗？我觉得，如果要承担政府的立场，他们必须也要承担历史，而一个新政府执政必须利用现今的政策作出改变，并承认前政府的行动。这些评论似乎没有明白这一点，而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搞一个毫无意义的战斗。

所以我非常想成为一个虚拟攻击手！——当然是善意的，进入到苛刻的二进制系统、穿越地图和思想，终于跃出了他们的显示器，并掌掴他们的脸，喊道：“我也是一个人呢！别以为我跟其他人一样！不要以为你可以轻视我的生命！不要排斥我！”并继续向他们理性地解释我话里的意思。最终，他们会简单地——从最初的震惊中缓解过来后——报警，并以擅闯民居为由将我逮捕。而我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一张最初善意的名单中，然后就被标榜成为易怒人群，出外通常会有一些限制，最后以他们支持的理由列入黑名单。

这些都穿过我的脑海，我意识到，同时我是在尽力区别自己，尽力从新移民中分离出来，让他们对打击首当其冲。我很伤心，因为我也是他们群类的一员，这些中国人，来自中国，像我一样，不是真正的加拿大人。我发现自己在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一方面，我是加拿大人，因时间的迁移、历史、个性和文化。另一方面，我绝不会被认为是加拿大人，因为我不是白人。我只是一个“应该感谢他们允许我们进入他们伟大国家的幸运混蛋”（这也说了很多次）的，而我觉得，我一直孤立的存在着，并且傻傻的相信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度有着平等和种族和谐这样的事，我深受打击，并在同一时间，为了捍卫自己（从理论上说，虽然我没有为自己辩护），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试着假装自己和中国新移民不一样，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活着却冒犯到善良的加拿大人。加拿大人从来不惹事，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加拿大人，你必须入乡随俗，不用你，这是我从事件中得到的消息（以及其他人在此之前，关于一切事情从环境问题到教师的权利）。因为政府关于种族相关法例，每个家庭里都有过自杀和愤怒的问题，是不是？最明智的决定是把问题抛到脑后，继续前进。我们不该再提起也不应该在任何人面前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应该这样吗？

我告诉自己，这些意见并不重要。他们这些匿名的妙语连珠，并不会影响我的发言决定，或改变我对整件事的心态。当我坐下来细写我的发言稿时，我发现无法写出我内心所有的想法——那些脑海里存在很久的可靠想法——我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这不仅影响我，还有千千万万的其他人（不过这样的文章曾经实现过吗？）。我写呀写，这些无意义的随笔段落，只带着愤怒和困惑，并一次又一次地用手掌拍打办公桌，让我无法妥善的思考任何事情。

从一个星期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我尽力去写，但我发现我不能，于是我从我摇摇晃晃地从白色塑料椅子上站了起来，周围踱步，然后走到楼下边吃饭边听音乐；那是我平时打发时间的方法。当我又坐下来写作时，我发现我再也无法写下去。于是我决定去睡觉，改天再写。

接下来的三天我试着写——写三个不同的讲稿，三个不同的哀诉，但最终还是哭着停下来，（当然是写了颇多后）无法完成。我沮丧又愤怒地哭着，仅仅因为伤心。我知道不管我做再多，这个世界也不会因此改变，然而当我静静地坐在屏幕前打字，我觉得这个主题能让我的情绪从中抽离。最后，我做这一切对于一个三分的演说根本不算什么，而我最终没有说。

我对写作无能为力，使我很沮丧，像在深渊上盘旋，我甚至不想在现实生活中跟这些人碰面（虽然我曾见过许多次）。当我简明扼要地用年轻人的角度对这些陈旧、自私、个人的事情娓娓道来的时候，我不想再说出我内心的愤怒和绝望之后让其他人在背后嘲笑。

最后我没去。我告诉我的母亲我太沮丧了，没办法收集我的想法，我无法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公开演说。一个年长活动家，周明辉，来我们家接我母亲，我最后跟他谈了他参加的其他会议。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这次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 意想不到的，她回来时心情特别好，我原以为特糟糕——她说其实有相当多年轻人参加会议，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人站起来发言。发言者大多是年龄较大的人，其中有些人用中文发言（带着翻译），其中一些人还用方言，那些发言者也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要对谁道歉？你真的了解这里的移民历史吗？”在发言者中，有一些原住民，也有一些白人。我的母亲也提到，屈厅长阁下似乎并不喜欢她，因为她说，如果发言者的家属都搬到这里，她任职机会就会降低了。她也说，她不相信这将会有多大的差别，但即便如此，我也要提交我写的 – 也许这篇文章，将会提交到代表自由党政府写报告的会议组织者手上。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觉得特别令人高兴或阿谀奉承。

在活动当天，我感到内疚而不愿意早上起来去上英语课，因为要提交一篇详细介绍了这些事件的草稿，接近奥威尔《猎象记》的风格。而在同一天的稍后时间，我必需要做我未完成的演讲。当夜幕降临，因为缺乏社会的贡献让我感到越来越内疚，当我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做着无关紧要的家务活和功课，我不停想我的母亲和其他人一如既往地另一个地方发表意见，却毫无考虑到其他人的负面情绪，令我感到无比羞愧。我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追求完美，毫无愧疚之心，一句话，就是无动于衷、漫无目的、一派胡言的反义词。